

# 真话要讲,更要听

“支持讲真话、道实情。”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会上的这番话,引起了广泛共鸣,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“讲真话”的可贵。

今年两会上,领导人让基层代表“把话讲完”,为的是听听他们的“锦囊妙计”;不少代表委员在讨论中纷纷抢话筒、争发言,为的也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、深刻思考说出来,以发挥积极作用。从这些场景中,不难发现,讲真话、道实情,其实关系两个方面:一是倾听者要有听真话的雅量,二是说的话要有过硬的质量。

千人之诺诺,不如一士之谔谔。真话的生命在于实事求是,是什么说什么,不夸大,也不缩小。按常理,讲真话容易,讲假话难。讲真话,一是一,二是二,说!可为什么有人还要说假话呢?无非是因为在不受批评的人面前,说真话比说假话更难。殊不知,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人、一个组织成长壮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行为规则。棉苗不修枝会疯长而不结棉桃,人缺少了批评会沾染歪

风邪气。批评是防腐剂,批评是对快马的加鞭。因此,营造讲真话的环境,重在有听逆耳之语的气度和智慧,关键是创造包容的氛围、宽松的环境。

很多时候,谰言与批评之中,包含着现实问题、突出矛盾,甚至是容易忽视的另一面。善于听真话,鼓励道实情,就能多一些发现的眼睛、思考的头脑,帮助决策者查找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,从而改进工作、推动发展,这正是真话的最大价值。

真话,发自真心,也源于实践。言为心声,只有心里有国家、有人民,意识里有责任、有忧患,才能自觉讲真话、道实情。也应看到,真话不是讲究说话艺术就能说出来,实情更不会自动跑到扩音器前。只有迈开两腿,走到群众中间,群众才会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。两会上,为农民工权益鼓与呼的代表,不少在工地和地下室体验过生活;为生态保护积极建言的委员,许多都下了实地调研、采集民意的工夫。

其实,不管是代表委员还是各级干部,只有迈开双腿、扑下身子,多下基层、多深入实践,多到群众中去,才会了解真情况,发现真问题,讲得出掷地有声的真话。倘若高高在上、信口开河,不但脱离实际,更会误国误民。

讲真话,还少不了一个“求真”。真是要用分析和归纳求来的。有些人“捡到篮子里都是菜”,缺乏去伪存真,由表及里,难免以偏概全。你说他讲的不是事实吧,倒也不假,但他说的只是细节的真实,不是本质的真实。

“言之所以为言者,信也;言而不信,何以言?”讲真话,向来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,也是改革攻坚期特别值得提倡的精神。值得注意的是,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、不断调整的利益格局、多元多变的思想观念,不仅需要敢说话的勇气,更需要冷静观察的定力、理性思考的能力,方能道出人所未言、形成真知灼见。这是今天我们激发真话力量的新考验所在。  
邓伟志

## 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

我以为,7.5%目标的确定体现了“经济增长实实在在、没有水分”的追求。对GDP的盲目推崇,是调整结构的阻力所在。在一些地方,形势好不愿调结构,怕影响经济高速增长;形势不好不取调,怕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。转方式,就要调整结构,淘汰过剩产能,去库存化,加强社会保障,培植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,等等。这些都会影响GDP的增长,但这是转型必然带来的阵痛。只有下决心经历阵痛,破除对GDP的崇拜,破除“一切为了增长,增长就是一切”的观念,才能调整经济结构,实现良性发展。

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,要注意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合理的比例,促使二者协调发展。虚拟经济相当于软件,实体经济相当于硬件。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中产生,又依附于实体经济,对实体经济有反作用。为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国际竞争力,参与国际金融竞争,需要在保持实体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,适度发展虚拟经济,当然,一定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损害。

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,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。我国前些年过度依靠投资,造成部分产能过剩、库存积压、投资效益降低、环境问题增多等一系列问题。实体经济的水分主要产生在投资上,一是破坏性的投资,通常与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,例如“豆腐渣工程”。二是无效的投资,通常与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有关。三是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,这类问题也通常与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有关。听说有上百个城市一拥而上要建地铁。不是每个城市的交通都适合用地铁来解决,一些中小城市现阶段是否有必要,必须慎重。因为地铁建成后还需要大量财政补贴来维持其运行。GDP中的水分不仅会浪费社会的财富,阻碍民生的改善,而且会形成一种“投资饥渴症”,有些地方为争取投资而不择手段,更是助长了腐败的蔓延。

挤掉经济增长的水分,还要依靠技术进步,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。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过大,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,但缩小贫富差距并不是设法使富人变穷,而是要努力使穷人变富。应当看到,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我国人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财富,但和发达国家相比,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按人均每年创造的增加值计,第一产业仅为美国的1%,第二产业仅为德国的1/5,这必然会严重制约我国民生的改善。我国绝不能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靠借债来改善民生,也不应当像美国那样靠滥发货币来刺激经济。因此,使穷人变富的关键,是要通过全体社会成员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,而政府则应当把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人民。

我深信,只要坚持改革开放,不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,就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,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。  
成思危

类似好的举措就应该效仿,不能只限于“自生自灭”,爱听不听的健康科普,强制性的措施应该出台,至少要从政策的层面引导国人的健康消费,这一点,迫在眉睫。

## 从纽约限制碳酸饮料说起

纽约“大瓶含糖软性饮料禁令”即将生效的前一天,该州最高法院做出裁决,宣布这一新规无效。为扭转大量肥胖人群的现状,纽约原本打算3月12日起禁止销售480毫升以上的苏打水和含糖饮料的。之所以要出台这一禁令,据纽约市政府官员说,是为了降低过去10年不断上升的肥胖率。统计显示,纽约成年人肥胖率已从18%升至24%,含糖饮料是最大“元凶”。

根据统计,2/3美国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,且1/3儿童就已出现肥胖趋势。到2030年,还将增加3200万肥胖者,肥胖率高达总人口的42%,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都是胖子,由此导致的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、高血压更为普遍,美国人的心血管风险以男性超过发达国家均值的34%,女性超过159%而位于第一,对于这一现状,含糖饮料是罪魁祸首之一。

事实上,类似的情况已经在中国显现,中国在短期内已经成了“糖尿病大国”,但并不是因为中国糖尿病的治疗水平世界领先,而是因为糖尿病的发病率在短期内“走在了世界前列”,无论是肥胖还是糖尿病,都与饮食中的热量过高有直接关系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中国的餐桌已经和国际接轨,高热量的食物、饮料逐渐成了国人餐桌上的主打,肥胖以及与肥胖有关的各种慢性病的激增就是后果,这一点上,中国已经在步美国的后尘。遗憾的是,除了针对大爷大妈的民间健康教育,相关部门没有出台过类似的法规,这种宽松直接影响着健康,特别是孩子,还能找到几个不喝碳酸饮料的孩子?青少年中,以饮料代水的情况更是普遍,胖起来的他们将给未来的医疗带来多大的负担?显而易见。如果考虑到这一点,类似好的举措就应该效仿,不能只限于“自生自灭”,爱听不听的健康科普,强制性的措施应该出台,至少要从政府的角度,从政策的层面引导国人的健康消费,这一点,迫在眉睫。  
佟彤

## 名校独大



据新华社报道,“我国大多数县区的校际差异比发达国家还要大,相当一部分乡镇和农村学生成绩达标率不到40%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两会上的发言,引起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。  
漫画/朱慧卿 点评/鲁刃

点评:教育资源的不均衡,带来的不仅是教育质量的差异。城乡差异、校际差异的拉大,背后是受教育权的实质不公。怎么给孩子一个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未来,这不是个小问题。

## 从方言和字幕谈起

前不久,从电视银屏上欣赏到了新拍的影片《白鹿原》,对我这样已很少去影院的老人来说,不啻是一件颇为让人高兴的事。

然而,这高兴很快就被同时而来的遗憾代替了:不知为什么,影片从头到尾,所有的人物都讲方言,一口陕西话(个别人物讲山东话),而且还土得要命,夹杂着不少特殊的词汇和俗语。我是中文系毕业的,学过一些语言学,但听起来仍很吃力,至少有三成是不懂的,对于一般的南方观众来说,估计要听懂还会更困难一些。

听不懂字幕嘛,好在影片下方打上了字幕。但台词说得快时,字幕上的方块字推得也快,老眼昏花的人很难跟得上。闹了半天,只好作罢,白白浪费了一段大好时光。

怅然之余,不禁有感而发:电影是

拍给广大观众看的,首先总得让广大观众听明白,看清楚,做不到这一点,什么宣传教育、艺术欣赏,不都是空谈吗?或许制片人和导演有自己的美学追求,认为方言更能突显环境氛围,更易于塑造人物,但是,若观众都不能看懂,创作者的这些美好愿望又怎么能达到呢?

类似的事情,还有不少。仍以影视来说,不知从何时开始,影片电视片的演职员表时兴越写越小,或挤在中间看上去像一幅图案;或随意在银幕的各个角落跳来跳去。新奇是新奇了,可就是看不清了。而且这份看不清的演职员表在银幕播放时会快速推进,让人眼花缭乱,却什么也记不住。莫非为了多做些广告,就非得这样让观众过不去吗?有时在放老片子时,干脆把后面的演职员表删去,殊不知这里面很多人名和职务恰恰是最引人注目、最有保留价值的。至于在公开售票的影院,剧情一完,就把场灯大开,不让人把片尾字幕看完,

几乎已成一种惯例,这也是不尊重观众(哪怕一部分)的做法。还有,某些电视频道在播放时,台标、专栏标记或预告广告会遮住正片内容,尤其是歌词或唱词的字幕,令人遗憾。虽是区区小事,却须引起注意。

再看看新闻出版方面的报纸、刊物。有些报纸在越出越多,动辄数十版,甚至上百版,编排又杂乱无序,A、B、C、D版混在一起,翻阅相当吃力。刊物也像报纸一样,不少文章都要转接,“下转”、“上接”字样频频出现,读时吃力,剪下来保存也很费事,尾巴似的小条子很容易遗失。

照理说,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业务应该是自主权的,旁人不宜多加干涉。但许多业务说到底其实就是服务,要为对象服务好,要把资源和钱财用在刀刃上,换成充分的效益,这就不能自说自话,置广大群众的需求于不顾,否则,说得轻些叫不妥,说得重些就是失职。

过传忠

## 武大校园樱花 还是免费参观为好

武大透露,13日起进武大赏樱花要收取门票,每张门票20元。(3月12日《武汉晚报》)

被金钱绑架,在有利必有不轨觊觎的现实下,武大也可能更多地想着收门票迎客赚钱。商家难免见利忘义,这也是圣洁的公共教育绝不允许成为牟取暴利工具的原因。另外,武大收费参观校园樱花美景,收取的门票费用到哪里去,准备怎么花都没有明确说明。

校园归校园,商业归商业,校商不能直接结合在一起。武大樱花不是企业产品,但收费参观就具备了企业化经营、商品的属性,已经跨到违规世界去了。这可不是门票价格多与少

的问题,也不是“象征收点管理费、卫生费”问题,而是违规问题。因而笔者认为,武大收费参观樱花要取消,回归免费参观公益社会管理。

至于客流参观带来的管理费用、卫生费用问题,武大既可以争取政府的支持,也可以争取社会公益组织、慈善机构、志愿者服务平台等提供支持服务。办法总比困难多,并不是非要收费才能解决的,比如开通网上预约,通过网上排号限制每天入流量。目前武大收费理由并不是硬道理,从某种层面看还是为商业化创收寻找借口,通过网上排号限制每天入流量。如果只想以樱花资源来进行收费,这种做法真不太好。

董克震

“《西游记》里有多少妖怪?”就算比它更荒诞一些又如何?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,智慧与智慧的较量才有意思。这样的挑衅激发人的思维,也刺激人反思,值得提倡。突破应试教育对文化创新能力的羁绊,打破常规是时候了。

## 怪诞问题 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

“《西游记》里面一共几个妖怪?”这是复旦大学2013年自主招生录取改革面试题中提出的问题。怪诞?离谱?有点。遇到这样的问题,肯定不会马上在脑海里搜索孙悟空打死或没打死的妖怪,这注定徒劳无功。稍微有点反应能力的人应该很快意识到,这是一道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题,比如有人问你“世界上共有多少厕所?”,那么你给对方完美答案毫无疑问是这个,“有两间厕所,分别是男厕所和女厕所。”

不过,考官问出“《西游记》里面一共几个妖怪”这样的问题却在情理之中,之所以这么说,请注意“录取改革面试题”这几个字,既然带有改革和表演的意图,那么考官不按常理出牌也就“实属正常”了。考官当然知道这样的问题有点无厘头。但恰恰是这样的考题,最能考验考生的反应能力与思辨能力。对此题目目瞪口呆的学生,只能说他在沉闷的学习氛围里待得太久,是时候用这种题目来刺激一下固化的思维模式了。

我记得去年有考官问出了“如来和玉帝谁大”这样的问题。有机灵的考生答道,“他们一个是道教,一个是佛教,不具可比性”,这虽不是什么标准答案,但若考官给这个回答判错,只能说考官的智商和情商都有问题。实际上,正是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,不但能考验学生的综合知识素质,也能从中发现学生的性格特点、审美与情怀等等,我若是考官,谁回答的最有意思同时又最无可辩驳,就肯定会优先录取他。

也有人考官的奇怪问题群起而攻之,是觉得考官的问题带有挑衅性质。仔细想想着实如此,考官挑战了多年来应试教育思维,挑战了执书本找标准答案的习惯性动作,更是挑战了隐藏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服从欲……且不说“《西游记》里有多少妖怪”这样的问题,就算比它更荒诞一些又如何?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,智慧与智慧的较量才有意思。这样的挑衅激发人的思维,也刺激人反思,值得提倡。

“请问莫言去年12月在哪个大学演讲的?”是另外一道被广为诟病的“奇葩题目”。考试考到莫言不提及他的作品却谈论他某场演讲的进程时间,这的确难以令考生接受,但换个角度看,这何尝不是在考验学生对文化时事的关心程度?如果知道莫言在大学的演讲时间,多少会知道一些他的演讲内容,而这些演讲内容所涉及的文学观念,是在其作品中难以很直接发现的。所以,对待考官的另类考题,我们不妨先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,考官这么做真的不是为了为难学生,而是通过考试给予学生一些启发。

解除多年来已成顽疾的教育定势思维,需要从教育制度的改变这个根本上出发,同时也需要老师与学生一起努力来打破这约束学生自由、独立思考的思想藩篱。如今复旦大学的教授已经过了河,考生们也就别在河水里摸石头了,赶紧上岸吧。  
韩浩月

随着社会发展,休闲理念深入人心,现行休假制度已难以满足公众需求。这时候,人们期盼推出更为合理可行的长期方案。

## 长周末难解小长假之困

对带薪休假制度特别关注的全国人大代表、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蔡继明,近日公开建议改进节假日安排,取消小长假制度,实行长周末制度。

几年前,蔡教授因主持假日改革课题,多次呼吁取消黄金周,落实带薪休假制度,在五一黄金周取消后引来争议。这一次,他的建议却赢得不少赞同。这大概是因为,实行小长假后,常出现休息3天后连续工作七八天、一个月休息和工作时间被大卸八块等情形,让人叫苦不迭。而根据他的方案,以双休日为中心,挪用节日来凑成3天周末,或可免除这些烦恼。

但这么做真的可行吗?或许,这样做值得商榷。记得当年取消五一黄金周,增加清明、端午、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,官方明确说这是为了增强传统文化影响力。但按长周末设计,假设中秋节是星期二,则要星期一提前过;在星期四的话,又要延后一天过。农历十四或十六过中秋节,那还叫中秋节吗?

可见,这个方案并不能使小长假制度摆脱困境。就算这样做可以纠正小长假的弊端,也很难减轻现行节假日制度的压力。取消五一黄金周之前,人们对集中休假方式颇为抱怨;取消之后,却又对黄金周充满怀念,而对小长假满腹牢骚。其根本问题在于,由于带薪休假制度难以普遍落实,人们不得不依赖法定假日探亲、旅行。因此,只要法定假日总量不变,无论如何调整都难以让大部分公众满意。

解除小长假之困,关键还在于落实带薪休假制度。对此,蔡教授也提出了一个新设想,即实行带薪休假旅游消费券制度,并赋予劳动者集体诉讼权利。但他提出的设计过于复杂,可行性有待再议。我认为,有必要从立法入手,规定劳动者享有若干天带薪休假日,如单位无法给假或劳动者没有休(完)假,一律按法定假日加班制度获得3倍工资补助。这么一来,才能加快推进带薪休假制度。

从黄金周到小长假,法定节日制度每次变革都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,而这又反衬了带薪休假制度缺位的尴尬。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,休闲理念深入人心,现行休假制度已难以满足公众需求。这时候,人们期盼推出更为合理可行的长期方案。

有关部门和专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,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。  
魏英杰